

品味人生文丛

《李鸿章：人生畅吟》

为洋务奔波，欲借以自强保权柄；  
做晚清重臣，因割地赔款留骂名。走马  
海外，执著于接务应世；优游官场，热  
衷于经营朋党。时代造就了矛盾的性格，  
历史则赋于斑驳的衣衫。他深知世  
道的艰辛，对人生自有一番独特的感悟。

李鸿章：

# 人生畅吟

王

5

9

安徽人民出版社

品味人生文丛

李鸿章：

# 人生暢吟

王健 方英 选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世超

装帧设计:蒋万景

**李鸿章:人生畅吟**

王健 方英 选编

---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 编:23006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铁四局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9

字 数:130 千

版 次: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212-01247-5/G·145

定 价:9.30 元

印 数:00001—10000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出版说明

人生是个道之不尽的话题，也是历代文化人颇为关注的难题。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一批批叱咤风云的思想家、学者不仅关注“救世”的现实问题，而且瞩目“做人”的永恒课题，他们或苦吟，或沉思，或倡导，愿苦难的中国人在乱世之中能图生存，求温饱，以免愧对养育自己的一方热土。有的还追求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和体会，可能或有前后不一的矛盾，这样那样的偏颇，言行相殊的缺陷，但是作为一代文化名人，他们确实各有自己关于人生的独特见解。我们这里选编他们的一些言论，既不意味着赞同他们的全部观点，也不是要提倡他们中一些人不妥甚至错误的做法，而是想为处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青年提供某种启示，引发读者对人生问题形成自己新的体味和见解，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充实，更有价值，对社会和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选编这类言论，并非易事，不仅要有史家的学

F243/06

养,而且要有选家的眼光和现代人的意识。这套《文丛》无论选择言论还是介绍、注释,可能都有种种不足甚至不妥,我们盼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

编 者

982221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 导 言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本名章铜，字渐甫、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谥文忠。1823年2月15日出生于合肥东乡磨店，兄弟六人，行二，故民间又称他为李合肥，绰号李二先生。

据传，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定居，因其八世祖许光照与其姻戚李心庄友善，李心庄无子，许光照以其次子出继李家，遂改许姓为李姓。李家靠经营小生意为生，清贫无田，至鸿章高祖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而且自更姓以来，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鸿章就出身在这样一个正在不断向上爬的地主士大夫家族中。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教私塾，由于父亲的缘故，李鸿章从六岁起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又先后拜堂伯父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打下扎实的经史功底。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试，于1844（甲

辰)年顺天乡试中一举考上举人,之后虽于次年的恩科会试落第,但很快即于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这一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他的房师则为孙锵鸣。当时,李鸿章年仅24岁。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10首,传诵一时。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进京后,他在担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昀等皖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更广泛的交游和更开阔的眼界。与他同榜的举人、进士同年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是所谓“中兴名臣”,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主掌翰林院的太老师翁心存(孙锵鸣之师,翁同和之父)在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他经世思想的形成,均有重要的启迪;而以翁、潘为领袖的苏南世家,对李鸿章后来统率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他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第后的道光“乙丙之际”(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从而奠定了一生学问、事业的基础。

1853年3月，太平军大举入皖，李鸿章得知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连夜代拟奏稿。奏上，咸丰即命吕为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随吕贤基一起回到安徽。次年，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保荐回乡办团练，经过李氏父子的招募训练，庐州团练“整齐皆可用”。

当时，庐、巢、和、含一带，为太、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李鸿章以书生带团练，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1855年11月率部首先夺回庐州的功劳，“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军又因攻克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诋纷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1857年10月，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5年的团练活动。这一阶段，为李鸿章以后出任淮军统帅提供了军事阅历和招集旧部的组织基础。

1858年8月23日，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仓皇出逃，辗转流寓至南昌正在为湘军办理粮台事务的长兄瀚章处。他本人遂于1859年1月投奔江西建昌曾国藩大营，充当幕僚。

当时，正值湘军三河惨败，需人尤急。对于李鸿章这位得意门生的入幕，曾国藩自然十分高兴。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须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加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大员同等看待；同时，曾国藩还经常有意无意的让李鸿章与幕府中的“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氏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必得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合肥俗语“打痞子腔”）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劝：待人唯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侃其“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俗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儒缓”，而李鸿章则明快果断；曾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然而，1860年秋，曾、李之间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两事发生严

重的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李元度追随曾国藩多年，患难与共，但他“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氏明知他的缺点却又命他领军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劾，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高出于曾。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郭嵩焘等一千友朋的劝解和曾氏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7月重回湘军大营。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从内心权衡，要想寻找崭露头角的机会，惟有依赖曾国藩的提携。回营不久，湘军攻下安庆，李鸿章的机会终于因上海士绅赴安庆请兵而到来了。

早在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王朝在整个长江下游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的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形同孤岛的通商口岸上海。为了免遭最后覆灭，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建“中外会防局”，企图借西方列强的武力来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代表，前赴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到后，先是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60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他还利用其父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说动曾国藩。曾

曾国藩最初属意其弟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亲老迈”坚辞。最后只好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和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为了生存，更需要结寨自保。因此，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庐州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愈战愈强，其中尤以西乡三山（即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诸部团练，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早在1861年5—6月间，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在幕府主持筹划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顺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于是，李鸿章便以西乡三山团练为基础，加上门生潘鼎新、故交之子吴长庆的庐江团练，以及旧部张遇春的巢县团练，再加上曾国藩从湘军中调拨的程学启、韩正国各部以及湖南新勇，共13营6500人，组成了新建的淮军。1862年4月，淮军在李鸿章率领下，分批乘轮船开赴上海。

李鸿章抵沪后，清廷即于4月25日任命他署

理江苏巡抚，年底实授，次年3月又兼南洋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40年。

李鸿章受命之初，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上海，能否守住上海孤城并徐图发展，是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他牢记恩师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经过1862年下半年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恶战，淮军守住了上海，令中外人士对这支“乞丐兵”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四方面入手，罢免了吴煦、杨坊等过于媚外的官吏，起用了郭嵩焘、丁日昌、刘铭传等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由于亲眼看到洋枪洋炮作战的威力，他产生“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他便“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使其成为国内第一支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并聘雇洋教练的近代化军队。在军费上，他采用“关（税）厘（金）分途，以厘济饷”的办法，用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和镇江绿营之需，而以厘金协济湘淮军。在对外关系上，他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充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滋闹事件，并最终解散了常胜军。

从1863年初到1864年5月，李鸿章率领淮

军接连攻下昆山、常熟、苏州、常州，显示了这支军队的作战能力。其中，当淮军占领苏州后，献城投降的邵永宽等8名太平军将领拥兵自重，李鸿章采纳了程学启的意见，果断地诱杀了8名降将，并遣散余众，从而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由此也可见他“眼明手辣”的一面。

然而，当清廷鉴于天京为湘军久攻不下，诏催李鸿章率军会攻时，李鸿章考虑到与曾氏兄弟的关系，在苏、常一带按兵不动，同时却掉头南下攻浙，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告他“越境掠功”。左、李二人从此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后天京终于被曾国荃部独力攻下。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谢：“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藩鉴于湘军“暮气已深”，同时也害怕“功高震主”，采取急流勇退，大批裁撤湘军的做法。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并进一步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显然具有将湘淮军留充国防军，以达到“御外侮”的目的。

1865年5月18日，清“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在山东荷泽全军覆没，清廷随命曾国藩任钦差大臣北上督师，曾国藩采取“以淮剂湘”的做法，殊料

前线淮军诸将竟拒不听命，而唯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鸿章马首是瞻，曾氏一筹莫展，只好由清廷再派李鸿章前来瓜代。此时，曾国藩悔之莫及，发出“撤湘军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深痛感叹。而李鸿章则在曾国藩所订“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的战略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扼地兜剿”战术，经过不到两年的追逐剿杀，终于分别将东西捻军一一歼灭。李鸿章得授太子太保、湖广总督，以镇压人民起义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负责处理此案的直隶总督曾国藩因民怨沸腾而焦头烂额，他自承“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写下遗嘱准备一死了之。朝廷急召正开往陕西镇压回民起义的李鸿章接办此案。李从陕西回兵东进后，却停留在保定盘桓不前，作壁上观，一任老师在火上烤。他甚至有点自得地写信开导恩师：“与洋人交，略参用老子手段，不轻以一死塞责。”等到曾国藩将一应事宜处理得差不多，所有罪名都顶了缸时，他才从容赴任，接任直隶总督，并且一干就是25年。

由于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清廷视为心腹的股肱重臣，因此，举凡清政府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均离不开李鸿章的决策和参与。随着个人地位和权势的上升，他所统率的淮军，陆续分防直隶、山东、江苏、

广西、广东、台湾诸省，成为国防常备军；以他为首领，包括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政见相同的官僚，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淮系集团，这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集团，李鸿章依凭这个集团，开始了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1863年，他在上海接连办起三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随后，又将其中一部分迁至苏州，成立苏州机器局。1865年，他在上海接收美商旗记铁厂，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不久苏州机器局迁到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将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也接手过来。这样，在早期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兴办了三个（另一个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和沈葆楨合办）。他不止一次说到：“练兵以制器为先。”后来在实际的生产运作中，他又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不必尽用其人。”于是又有设广方言馆、译书局和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之举。

19世纪70年代后，李鸿章痛感中国积弱不振，原因在“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结论，逐步将洋务活动的重点转向以“求

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1872年，他以“官督商办”的形式，首创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此后，在整个70—80年代，他先后创办河北磁州煤矿（1875）、江西兴国煤矿（1876）、湖北广济煤矿（1876）、开平矿务局（1877）、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1880）、唐胥铁路（1881）、上海电报总局（1884）、津沽铁路（1887）、漠河金矿（1887）、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铝银矿（1887）等一系列近代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个行业。在经营方针上也由官督商办逐渐转向官商合办。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面对清廷内部顽固派的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指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洋务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纲领，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可能采取“以夷制夷”的手段，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以外交能手自负，一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1871年9月13日，在办结天津教案不久，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与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双方基本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日本咄咄逼人的姿态中，看出它“日后必为中土之患”。果然，1874

年5月，日本发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为钦差大臣赴台巡阅，并提调驻徐州的唐定奎部准军6500人分批前往驻防。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1874年6月与秘鲁签订《中秘通商条约》，1876年9月与英国订立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秘鲁华工，后者则是因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而导致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了行将决裂之局。在他的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道歉”，成为近代驻外使节之开端。但该条约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口，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期间，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定”，旋为法国政府反悔，战争爆发。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慈禧发动甲申政变，罢黜恭亲王，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再度抬头。李鸿章在1884年5月又与法国代表福祿诺签订了《李福协定》，随着法军6月大举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到清军分别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取得镇南关大捷和淡水大捷后，李鸿章才终于与法国代表巴德诺正式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法国从条约中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向法国开放等权宜。李鸿章高唱